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两次鸦片战争

诗文选译

● 何 瑜 夏明方 ●



巴蜀书社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

诗文选译

（清） 魏 源 著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两次鸦片战争 诗文选译

何 瑜 夏明方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王大厚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两次鸦片战争诗文选译

何 瑜 夏明方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5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I·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排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戟，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十八世纪末叶,在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衰落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在迅猛发展,以英国为首的殖民强国一方面用外交谈判和武装挑衅相结合的方式打破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逐步扩大对华的鸦片贸易,借以牟取暴利。1800年(嘉庆五年),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各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570箱,1838年(道光十八年)则激增至40200箱。鸦片如潮涌入,不仅严重毒害了中国人民,而且引起了大量白银外流,导致银价飞涨,清廷财政拮据。

1838年9月,湖广总督林则徐上疏道光皇帝,力言鸦片危害,主张严加查禁。同年12月底,道光皇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协同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领导广州军民与英、美等鸦片贩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外国烟贩们缴出鸦片二百三十七万馀斤,并在6月3日至25日在广东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在美国和法国的支持下,1839年10月1日,英国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并任命乔治·懿律为英国东方远征军总司令和谈判全权

代表，义律为副全权代表。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侵略军根据事前的部署，相继封锁珠江、厦门、宁波等沿海地方。7月5日，英军北犯，攻陷定海，疯狂地抢掠屠杀。8月，八艘英舰闯至天津海口，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在照会中提出了赔偿货价，也就是被销毁的鸦片烟价、中英官吏平等相待、割地赔款等一系列无理要求。

定海失守已使道光皇帝慌了手脚，英军逼到天津，更动摇了他禁烟和抵抗的决心。忧愤之中，他斥责林则徐等人上年在广州禁烟“措置失当”，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在大沽口与英人谈判。接着，又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人继续议和，并将主战派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革职。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后，一反林则徐所为，将战守设备大加裁撤，原来募集的数千壮丁、水勇，也都加以遣散，并重用汉奸鲍鹏等人，凡事不与广东同僚商议。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在谈判中突然攻占沙角炮台。战后，琦善仍然一意孤行，不作战守准备，与义律（此时懿律已生病归国）谈判求和。1月21日，义律单方面发布公告，即所谓“穿鼻草约”，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六百万两。这一纸并未签订的草约墨迹未干，英国侵略者便强行侵占了香港。

同年1月底，道光帝接到沙角、大角炮台陷落的消息后，决定对英国宣战，并派遣御前大臣、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主持战事。2月，英军猛攻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率兵英勇抵抗，壮烈殉国。琦善亦因败绩昭彰而被革职锁拿进京。5月，奕山到达广州后，盲目派兵夜袭英船，初获小胜，旋即大败。英军占领泥城、四方炮台，居高临下，炮击广州。5月27日，奕山乞和，由广州知府余保纯

与义律订立《广州和约》，允缴赎城费六百万元，清军退驻广州城六十里以外。这个战败投降的协定，奕山等人不敢上奏，谎称夷人恭顺，“乞还商欠”，结果得到道光帝的批准。英国侵略者在广州的暴行，引起了广州城乡人民的极大愤慨。5月底，广州城郊三元里一百零三乡的上万民众奋起抗英，打死打伤英军数十人，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人民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1841年8月，英国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来华，接替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和侵华英军总司令伯麦的职务，以扩大侵华战争。8月26日，英军攻占厦门。10月，定海、镇海、宁波相继沦陷，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相继战死。镇海失陷时，清钦差大臣裕谦投水自尽。道光帝忙派协办大学士、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领兵赴浙江应战。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3月，在敌情不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奕经集中一万多名士兵，从绍兴分三路进军，幻想同时收复宁波、镇海和定海三城，结果大败而归。

浙江战败后，道光帝深恐英军入侵长江口岸，于是严谕两江总督牛鉴加强江苏、宝山等地防务。但英军为了用武力压服清政府，4月份即从印度调来大小船只百餘艘，增援近万名军队。5月18日，英军攻陷浙江海防重镇乍浦。6月进攻长江口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血战殉国，上海失守。7月英军进犯镇江，驻防清军殊死奋战，京口副都统海龄自杀身亡。镇江失陷后，道光帝尽管继续下令沿海各地进行防堵，但已逐步接受了妥协派官员的“羁縻”政策。8月初，英军战船侵入南京江面，道光帝忙派耆英为钦差大臣与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议和。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等人 与璞鼎查在南京江面英舰皋华丽号上，按照英国侵略者提

出的条款,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规定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等。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大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他们在华攫取的各项侵略权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扩大中国市场,1856年(咸丰六年)10月,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咸丰七年)春,法国借口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而与英国组成侵华联军。同年7月和10月,以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为首的英国侵略军和以法国全权代表葛罗为首的法国侵略军先后到达香港。美国和俄国政府则表示支持英法联军侵华。12月28日,英法联军进犯广州,次日广州失守。1858年(咸丰八年)1月5日,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死于加尔各达),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和广东巡抚柏贵投降,联军在广州建立了以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4月,额尔金、葛罗与俄、美各公使集兵舰于白河口外,企图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清政府初未就范。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随后直逼天津城下,扬言进犯北京。咸丰皇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议和。6月,被迫先后与四国签定《天津条约》。11月,又在上海分别订立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其间沙俄不仅抢先迫订中俄《天津条约》,而且早于5月间便指使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用武力胁迫清黑龙江将军奕山在中俄《瑷珲条约》上签字,强行割去大片中国领土。

1859年(咸丰九年)6月,英国公使卜鲁斯率舰队北上,武装换约,法使布尔布隆、美使华若翰率兵舰随行。清政府以大沽设防,指定四国公使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英、法公使蓄意挑衅,坚持从大

沽溯白河前往北京。25日上午,英法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动猛攻,清军在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督率下,奋起迎战,击沉英法舰船多艘,击伤英舰司令何伯,联军舰队在美舰的支援下狼狈退走。美使华若翰则按清政府指定的路线进京,于8月间在北塘换约。

大沽口保卫战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侵略者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1860年春,英法联军又卷土重来。同年4月,英法联军侵占舟山;6月,法国侵略军占据烟台;7月下旬,英法联军近二万名,舰船二百餘艘齐集大沽口外。由于僧格林沁疏于北塘防务,致使侵略军于8月1日在北塘顺利登陆。接着,清军在新河、军粮城、唐儿沽节节败退,大沽炮台亦于21日激战后失陷,直隶提督乐善阵亡。当晚,僧格林沁退往天津,逃至通州以南的张家湾。慌了手脚的咸丰皇帝急派大学士桂良等人与联军谈判,但因侵略者需索苛重,天津、通州谈判相继破裂。联军进攻通向北京的要隘张家湾、八里桥。经过激战后,清军先后败绩。9月22日,咸丰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留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负责议和。10月6日,英法联军闯进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大肆抢劫焚毁,大火三日不熄。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据北京城,奕訢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的居间“调停”下,于24、25两日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签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条约》,批准书同时交换。事后俄使自称“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逼奕訢与之签定中俄《北京条约》,再次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和攫取更多特权。同年11月,英法联军陆续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6页)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起点。在这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危难时刻，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些反映两次鸦片战争的史籍和文学作品除官修史书外，主要是保留在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众多私家著述中。其中包括政论文章、小说、诗歌、散文、书信、日记、墓志铭以及为数不多的戏曲和绘画。官修史籍主要是《筹办夷务始末》和道咸两朝的《清实录》以及大量的奏疏和上谕等。就历史真实性而言，官修史籍与私人著述二者应是各有所长，瑕瑜互见。但从作品的思想性、文学性和反映两次鸦片战争的全貌来看，后者显然是胜过前者。所以作者的选材主要是取自于私人的著述。作者的编选原则主要有两点：一是选材内容尽可能全面反映“两次鸦片战争诗文”的整体面貌，所以在丰富的历史文学资料中，注重编译思想性、文学性均为上乘的优秀作品；二是选择的诗文内容尽可能概括两次鸦片战争的全部过程。为此，作者一方面紧紧抓住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这两次重大事件的各方脉络，一方面注意到从大臣的奏折到各种私家著述的具体内容，反复比较，优中选优，以求得读者在了解两次鸦片战争内容的同时，从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中受到教育，获得启迪，产生震撼心灵的共鸣。

在千宗万卷的鸦片战争史籍中，私家著述占有很大的部分。他们有的综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楠的《夷氛闻记》等。有的记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内容，如夏燮的《中西记事》。较多的是记载两次鸦片战争的部分内容，如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战事的《广东军务记》（无名氏）；记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侵占广州的《触藩始末》（华廷杰）和《广州入城始末》（七弦河上钓叟）；记述英法联军侵占天津的《津门夷务记》（无名氏）以及记述侵略者进攻北京，焚毁圆明园的《庚

申夷氛记略》(无名氏)和《庚申北略》(无名氏)等。更多的则是将战争中的一组镜头或一个人物写成一篇文章或几首诗歌收入自己的诗文中,如林则徐的《左云山房诗钞》,徐继畲的《退密斋文集》,薛福成的《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等。还有的专门搜集鸦片战争期间的公私文件,如怡云轩主人所辑的《平夷录》,无名氏所辑的《入寇志》等。

不论是记载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还是描述战争的某一片断,作者所接触到的有关史料和文学作品,其中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是描写鸦片的危害和论述如何禁止鸦片流入中国。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这种因鸦片大量流入而引起的银贵钱贱、社会治安等一系列问题便严重地困扰着清朝政府。它不仅反映在诸多官方文书和奏折之内,而且亦反映在流传不多的小说和剧本当中。如霁溪八咏楼的《芙蓉外史》、漱六山房的《黑狱》、观我斋主人的《罌粟花》以及钟祖芬所著的剧本《招隐居》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外来鸦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贫困和痛苦,严正斥责了英国殖民者走私鸦片和发动鸦片战争的罪恶行径。

其二是揭露和抗议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的野蛮暴行。这方面内容几乎在每一种作品中均有反映。如《广东军务记》(不著撰人)载:1841年5月(道光二十年四月)英军攻占广州城外泥城与四方炮台后,“肆行无忌,于附近各乡,昼夜巡扰,打破门扇,强夺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妇女,发掘坟墓,祸及枯骨,种种贻害,不可胜言。”面对凶残的英国侵略者,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非但不敢抵抗,反而压制人民的抗英斗争。但英雄的广州人民不畏强暴,他们不仅取得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伟大胜利,而且还给后人留下了气壮山河的文字记录。除本书已释译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外,还有《粤民

檄英夷文》、《乡民讨英夷檄》、《粤民示谕英夷》、《三元里居民示谕英夷》、《告谕英商大略》、《闽省城铺户居民等公启》、《致英吉利国领事官信稿》、《三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等。从这些珍贵的文献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当时广州城乡人民是如何据理痛斥侵略者的侵略罪行，抒发了他们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情怀。

其三是歌颂在鸦片战争中英勇献身的爱国将领。这部分内容其中很多已包括在描写两次鸦片战争的作品当中了，另外也有专门赞颂的，如本书所释译的有关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爱国将领的英雄事迹。另外还有讴歌清军下级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如吕士宜在《记游击张公死事略》里描写晋江人张然在厦门保卫战中，英军“突从文汛口安海汛上岸，公脱身与战，军人咸劝阻。公曰：揍一丑人，受两朝厚恩，今即死幸极矣，忍偷生乎？提大刀杀夷十余人，刀折中创，裹创拔剑连斩数夷。而夷势益张，左右二翼复不至，于是以冠覆面，凭树僵立而死。杨、纪、李三人亦力战死（指把总杨肇基、纪国庆、李肇明三人），夷人义，穴埋加簣（zé，床席）焉。”

四是揭露和痛斥某些清朝将领的腐败无能。这部分内容在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中所在多有。如不著撰人所书的《军务记》一文就揭露了琦善等人卖国投降，虐杀百姓的罪恶行径，文笔犀利，一针见血。“是役也，有琦善者，莅任未及半载，流毒以极千条。有意卖津，虎门之弓衣尽撤；无心为国，羊城之戈甲不修。香港因而遇灾，乌涌从而致害。近海一带，望海吁嗟。听赤子之呼啼，泪随声下；闻苍生之啼叫，目触心伤。凡百凄凉，万言难尽，欲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屡矣。”因此类内容过多，篇幅过长，恕不多言。

在选译有关鸦片战争的诗文中，最令我们荡气回肠、抚案深思